

● 陈秀武 著

近代日本 国家意识的形成

本书将从理论上廓清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基本特征及构成内容，梳理江户时代的日本民族从『藩即国』理念向近代国家意识转化的发展脉络及其思想历程，并对这种崭新的国家意识在日本近现代史和对外关系上的作用予以深入解读。

主编：尚侠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主编：尚侠

近代日本国家 意识的形成

陈秀武 著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陈秀武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ISBN 978-7-100-05815-5

I. 近… II. 陈… III. 国家-主权-研究-日本-近代 IV. D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88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主编:尚侠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陈秀武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815-5

2008年4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8

定价: 21.00 元

作者简介

陈秀武 1970年出生于吉林农安。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
199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获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获博士学位。2003年完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2005—2006年于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做客座研究。专攻日本思想文化史、日本政治思想史。出版有专著《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并发表论文30余篇。

本丛书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代序：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历史思考

尚 侠

2006年,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认定的对华学术援助单位,开始实施为期6年的中期发展计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北师大日本研究丛书》是这个计划的重点工程。全书计8本,原则上均由日本研究所的教师完成,预定2012年出齐。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自然也就成了《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的第一位读者,然而,还要为这本书作序,委实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术业有专攻。按照日本学例行的学科分野和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关于这套《东北师大日本研究丛书》的设想,每本书的序言均应由各专业有影响力的先生来分别完成。如此说来,这本书的序言非日本史的学者莫属。我的专业是日本文化,虽然从广义上与这一选题还算搭界;然而无论如何却并不身在科班的行列中。大约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与一位友人合写了《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书,去请楼适夷先生作序。先生当时曾写有这样的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之患也在好为人序。无奈只能自说自话,以报答两位年轻友人的再三的嘱托。”先生已然作古,如今轮到我去感受和接近这样的心境,于万般慨然之中也只有勉为其难了。

以我的所知,近代日本史一直是日本人文学界的热点所在;高手

2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如云,成果累累。这种情形,在日本史研究的其他领域是鲜见的。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是中国的学界所不应忽略的。其一是客观上近代史在日本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其二是日本的文化人非常在意对于这段历史的现实认定。不仅如此,从近代日本国家的形成,到加藤弘之、福泽谕吉、中江兆民和吉野作造的个案国家观研究,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对近代日本人的精神的形成所起到的文化导向作用和影响力也是其他学科无法比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实际上闯入了一个涉外研究的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范畴;特别是对一位中国的日本史学者而言,介入无疑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作者陈秀武是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新生代学者的一位代表,他的学养和驾驭这一话题的能力实际上也是国内日本学界现状的某种标示。“国家意识”的视角至今未被日本的学术界择取,这显然并不是治学方法的迥异,而是文化立场与价值观念的不同所致。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学术研究所应致力于达到的境界,借助可资凭借的、丰厚的既有成果无论如何是研究者的幸事。做得是否到位见仁见智,学术探讨与创造精神永远是一种互动的存在。

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不仅柯林武德这样说,西德尼·莫纳斯,包括他的学生德里克也都有相近的认识。智者们关于历史是一种阐释活动的论断,在本质上揭示了史实与史论的二元存在的永恒性;任何自诩为最终性的历史叙事都是靠不住的。“所谓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这是《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中关于“国家意识”的定义。它把一个与文化群体的感觉、观念、心理、情感等相对宽泛的存在统统囊括了进来,事实上也进一步面临了历史叙事的抽象性与复杂性。正如耶利内克在《一般国

家学》中所指出的：“确定将始原的共同体视为国家的初始时间点并非易事”，国家的出现只能在种种“假说”的基础上加以判明。可见判断国家形态的标准不同，结果自然各异，国家观念的理解也会大相径庭。因此，只有将“国家意识”置于某一历史时段内加以考察，才会接近问题的本身。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世的日本国家意识并不存在，或不值得讨论。近代国家意识的探讨价值，概在于伴随着欧洲列强对东亚的入侵，所造成的这一地域民族心理的诸多变异。如何应对变故，追求近代国家的自我认同与他我认同，是时代向近代东亚提出的一个大课题，而日本民族的答卷正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在一个特定关头的个性体现。足见对这一话题的特别关注，不仅对日本史而且对东亚史的阐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这项工作显然又不应该仅仅是日本学者的事情。

国家是国家意识的载体，也是国家意识赖以演进的平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强调“国家的主要特征，便是脱离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因此欧洲人便有很长一段时间抱有“警察”即“国家”的“警察国家观”。江户时代的日本与近代欧洲的情况相左，幕藩体制下的“藩即国”的理念带有浓重、封闭的地域色彩，将藩视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意识淡薄。直到培理来航以后，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等先哲捷足先登，强藩联合的政治意愿才在日本悄然萌生。这两个人之所以成为日本近代思想史册上的重要存在，其理由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在寻找民族根性和国家起源的原生态意义上，离开他们日本便丢失了重要的东西。

国家观念是以制约着人类群体的社会形态为基础形成的，所以游牧民族还不具有国家形态。这种认识只有在西方才会被普遍接受。古代东亚是儒教文化的领地，离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4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日本人找不到另外的思想支柱。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代里,只知晓“朝廷”而淡薄“国家”,中国人如此,日本人也概莫能外。“天下”这一概念的空泛性虽路人皆知,却可以在国家理念被民众真正接受之前长期存在。如果说清朝的“近代国家”演练始于1880年以后,那么江户日本的“近代国家”建设则早于中国一个世纪左右。1778年俄国商船的来航和要求通商,直接刺激了民间思想家们的思考。一时间关于建设国家的新观念如雨后春笋,导致了种类繁多的近代国家论的最初形态的产生。从本质意义上讲,这是日本对传统的“华夷秩序”的挑战与摆脱,也是日本国家利益的绝对要求。这一时期的“日本型华夷秩序”以及“海国观念”的确立,都是无须讨论的明证。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的农耕文明被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血泊之中,染指日本被西方列强迅速提到了日程表中来。幕府的腐败无能与仁人志士的爱恨冲突,曾使得尊王攘夷及尊王倒幕的历史悲壮同样无法规避与近代中国惊人的相似。所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的“散”并没有由此得到根治;而日本文化的“聚”却逐渐在国家意识高于一切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重要整合。各藩的有识之士冒脱藩罪及家族株连罪之大不韪,为彻底清除“藩即国”的意识形态而奔走呼号、肝脑涂地,并逐渐形成了为日本文化所独有的强制力量。坂本龙马在萨摩藩与长州藩的联合问题上,曾在马关为长州藩的巨头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和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斡旋,相关史料记载了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曲折。坂本龙马对桂小五郎说:桂先生,我目前正在研读西洋书籍。西洋诸国将国民如何生存看作政治的根本,但日本如何呢?日本政治家有谁到国民的厨房看过、有谁了解过他们在吃什么、穿什么、生活状况如何了呢?仅此一事就可以证明幕府的统治必

将坍塌。坂本龙马因此怒斥双方道：“什么是我藩的面目、体面和荣誉？请不要敷衍了事，你等仍然背负着封建制度的幽灵吗？为什么要忘记大的日本，而在同一日本土地上互相立牌、设立障碍，分清我藩、我主以区别他藩，成何体统？我不认为西乡先生和桂先生是如此笨蛋。”（菊池寛：『新日本外史』）

正因为近代日本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坂本龙马们的实绩，王政复古后确立近代国家意识才会成为明治政府有所作为的前提。“五条誓文”、“政体书”、天皇亲政的“宸函”，包括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国策的提出，才在近代国家意识的意义上成为可能。外交上，修改不平等条约自然也是新政府的紧急任务之一。这样，围绕着新国家的打造，国家意识的具体化形态逐渐形成了。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包括国民意识与民族意识两个方面，这是《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一书的重要见解之一。作者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又把近代日本国民意识细分为人民与国家关系认识、民权与国权关系认识的两个层面。认为在处理人民与国家关系上，明治政府采取的是民主和专制的两手；在处理民权与国权关系上，直面的是国民优先还是国家优先的问题，采取的方式是绥靖式的，因此才有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生。而终极的决断显然是以强权取代民权，向国民布达民权必须服从国权的道理。近代日本民族意识的两个层次则体现为，一是对日本与东亚各民族关系，二是对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认识。在处理二者之间关系时，日本的立场鲜明地表现为，在手段方式上对国家利益的绝对服从。无论是战争与和平，也包括对话方式上的平等、对等与不平等，都不过是这样的国家意识的题中应有之意。沿着这样的学术思考与推理，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确立才具备了历史叙述的合理性，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的讨论也于是成为

6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一种递进式的结果。

这样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见解,构筑了作者自己的认识体系,而且不乏创建性的努力,是堪可令人首肯的。如果我的这一感受可以得到更多同仁的共鸣,则不仅是当局者的过誉,相信也是作者本人的期待。

写于2008年早春

目 录

前言	1
引子:记纪神话与政治	13
上篇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胎动	35
第一章 幕末日本概说	36
一、体制动摇的幕末日本	36
二、思想纷呈的幕末日本	41
三、西风东渐的幕末日本	62
第二章 幕末国际关系与国家论	76
一、东亚国际关系与华夷国家论	77
二、日本同欧美的关系与海洋国家论	88
三、幕末日本的国家意识	105
第三章 水户学派说	111
一、德川光国主持编修的《大日本史》	112
二、藤田幽谷的后期水户学	117
三、会泽安的尊王攘夷思想与开国论	122
下篇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确立	128
第四章 “草莽崛起”——近代国家意识的阵痛	130
一、“草莽崛起”与尊攘运动的深入	130
二、坂本龙马的“国家意识”与胜海舟的忧虑	156

2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三、黑船事件的思想史意义	167
第五章 传统国家意识的崩溃	179
一、条约改正问题	179
二、传统国家意识的崩溃	190
三、国家思想的多样化	203
第六章 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的确立	222
一、私拟宪法	222
二、《大日本帝国宪法》	239
三、近代教育体系与教育力量	255
参考文献	278
附录:幕末日本对外关系简表	295
后记	300

前 言

近年来,在中日关系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东海石油危机问题等所引发的中日民族情绪已然达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史高峰。在日本右翼的鼓噪与日本国家整体右倾化的时下,不断责问“日本政府怎么了”、“日本国家何去何从”的声音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理性地面对当前的中日关系,从思想深处挖掘日本所以至此的文化思想根源,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研究任务。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日本国家意识或许能够成为我们了解日本民族及其行为方式的一把钥匙。

所谓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不同时代,国家意识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国家意识往往外化为对国家认知的思潮与主义等,有什么样的国家意识就有什么样的行动选择与之相匹配。那么,日本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国家意识?日本国家意识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何种行动选择?尤其是,在两千年来的中日文化交流中,这种意识在处理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无疑,这些问题都需要系统的思想清理与理论反思。另外,从中日关系的角度而言,也有必要从日本思想的原生态着手,找

2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出日本人种种思想及行动发展的历史联系,准确把握自古以来日本国家意识的产生、发展、变化,以便我们更好理解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认识及行动选择。

在众多对日本国记载乃至研究的文献中,《山海经·海内北经》第一次提及古代日本,即“南倭北倭属燕”,这是中国以倭称日的开始。直到唐高宗李治咸亨年间,因“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旧唐书》卷199《东夷传》)。另据《明史》记载,“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此后,日本国名便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中。日本学者们研究日本古代国家的时候,也多以中国史书记载为依据。

就对日本研究的深入与对日本民族性格把握的准确度而言,清代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与民国时期戴季陶的《日本论》堪称中国人研究日本的两部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日本国内花样翻新
的社会思潮不断地涌现出来。虽然直接以“国家意识”为题进行研究的论文及著作不多见,但学者们仍以此为契机,以国家意识外化的思潮、主义为题纷纷著书立说,作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探讨。如孙政的《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就是一部从战后的新国家主义入手展开研究的专著。从思潮角度探讨的著述有刘江永的《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该书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的政治思潮,诸如“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思潮”、“日本修改宪法思潮”、“日本的右翼思潮”等作了概述。高增杰主编的《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一书,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方法与思想史的宏观操作方法,抓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思潮中的两大主流——民族主义思潮与和平主义思潮互动消长的演

变,揭示了日本社会思潮整体右倾化的总趋势。此外,还有蒋立峰主编的《当代日本社会思潮》、宋益民的《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初析》、方柏华的《冷战后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探析》等。

但在笔者看来,上述研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1)中国的正史只是按照时代分别记载了当时日本的存在状态,还根本没有触及古代日本人对国家的认知等思想领域,古代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契机及过程尚需细致探讨。(2)对国家意识外化的思潮研究也好,对主义的研究也罢,笼统地概述思潮发生的背景与影响往往最常见,没有站在文化层面上来展开研究,造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对日本进行研究的方式与水平。(3)思想是行动的指挥。以上研究对中国正史对日本国家思想变迁带来的行动抉择变化注意不够,重史实而轻史论。(4)将日本国家意识置于东亚乃至国际关系格局中加以考察的研究意识淡薄。以上问题表明,目前有必要对日本国家意识展开更进一步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

“国”之概念的成立是国家意识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对“国”这一概念的原生态思考是国家意识产生的思想根源。日本神话中的“国”、“岛”、“洲”的概念有重叠又有所不同,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从古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从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到倭五王时代,都以获得中国皇帝的认可为惯例的权力源泉,古代日本心甘情愿地成为中国的附属国。至隋唐时代,日本派遣大型使团和留学生前来学习。这期间,也发生了日本不甘居下位而向中国提出挑战的事情。例如,两次所谓的“国书”事件即是佐证,据《隋书·倭国传》记载:607年第二次遣隋使携带的国书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另据《日本书纪》记载,第四次遣隋使带往中国的国书,首云“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等措辞。可以认为,这是古代日

4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本试图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最初尝试,但是,鉴于两国综合实力的对比,日本也只能服从既成事实。此后,日本还派遣了十九次遣唐使赴唐学习。后来随着唐朝的衰落,日本政府遂接受菅原道真的建议,于894年废止了遣唐使制度。至此,围绕附属国意识而展开的古代中日交流告一段落。

据《宋史》卷491《日本国》记载:“雍熙元年(984年),日本国僧裔然与随行五六人浮海而至。……太宗召见裔然,赐紫衣。裔然复求谒五台,许之。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裔然入宋被认为是日本入宋的第一人,日本利用裔然入宋巡礼拜见宋朝皇帝,推动了与宋商之间的交易,迎来了日本僧侣入宋巡礼的繁盛期。但是,政府间的交往因元朝攻打日本一度中断。1404年,明成祖在朝贡贸易的前提下,与日本签订了《永乐勘合贸易条约》,将中日关系重新限制在华夷体系之内。这种朝贡贸易对日本发展经济十分有利,为日本摆脱中华大国的束缚、摆脱华夷体系或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体系积累了经济实力。可以认为,勘合贸易是华夷体系在中世日本发生华夷之辩的经济根源。因此,自勘合贸易以后,日本的国家意识在寻求脱中国化的轨道上前行,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衍生准备了前提条件。

笔者原拟从古代日本“国”之概念的成立入手,探讨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其中内容大体包括日本记纪神话中的“国”之概念的成立、日本风土记中的“国”与“洲”、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与日本的附属国意识、朝贡体系与东亚的华夷秩序、华夷秩序在中世日本的变迁、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战后日本的国家意识以及日本国家意识的若干理论问题等等。但由于笔者的能力所限,本书将聚焦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梳理江户时代的“藩即国”理念向近代国家意识转